

# 将西方文论与俄罗斯文学对接

## ——俄罗斯文化评论家利波维茨基访谈

侯玮红

**内容提要** 马尔克·纳乌莫维奇·利波维茨基（1964—）是当代最为活跃的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和文化学者之一，曾任教于乌拉尔大学，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他是最早研究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者之一，出版的相关著作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历史诗学概论》（1997）、《悖谬逻辑：1920—2000年代文化中（后）现代主义话语的转化》（2008）。他与父亲纳乌姆·列伊德尔曼·利波维茨基合著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和我国学界影响深远。本文是就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及个人文学研究之路等问题对评论家进行的深度访谈。

**关键词** 利波维茨基 俄罗斯文学 后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

马尔克·利波维茨基这个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刚刚涉足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起，就不断出现在阅读视野中。可以说，他的文章与专著是笔者从事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二十多年来，他早已成为我虽未谋面却十分熟悉和尊敬的老师与同行。2014年底，在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二十一世纪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终于见到了他。眼前的他与我想象中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相去甚远：身材圆胖，头顶光亮，笑容可掬，甚至有几分憨态，性情快乐而又随和，如果摘掉眼镜倒有点弥勒佛的感觉。紧张的会议日程结束后，在川大附近一间雅致的咖啡馆内，他接受了我与西安外国语大学温玉霞教授的采访，就自己的研究成长之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整体状况、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等问题与我们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交流。

**侯玮红（以下简称“侯”）：**这次会议使我能够和您结识，真是太高兴了。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您，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我知道您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因为您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和父亲合作的。可否谈一下您的家庭、您的成长之路和文学批评之路？

**利波维茨基（以下简称“利”）：**是的，我的确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母是乌克兰的敖德萨人，他们六十年代从那里的大学毕业。我父亲那时已经有志于从事文学批评事业，写了几篇关于当时的战争文学作家邦达列夫、巴克兰诺夫的论文，我母亲的专业是化学。犹太人在敖德萨的生活太艰难了，虽然他们很喜欢那个地方，可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正好他们有亲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于是投奔过去。没想到妈妈很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sup>①</sup>找到了工作，爸爸考上了这所大学的研究生，之后以优等生毕业，从此他们就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一辈子。我生于1964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24至1991年叫这个名字，之后更名为叶卡捷琳堡市）按照中国的标准不能算是很大的城市，但是很有意思。这是一座工业城市，苏联时代一直对外封闭，外国人不准进入，因为那里有很多军工企业。那里的知识分子相当活跃，大学里活动频繁，剧院里常有新剧目上演。我1981年考入这所师范大学的语文系，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妻子并结婚。我们在适当的年龄目睹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全部进程。我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的老师，他可以说在文学研究方面引领了我十四年。中学时代我就开始在他的指导下写文章，大学第一年末写成第一篇正式的文章，经过父亲的严格修改（我记得整整有十五稿），终于在《乌拉尔》杂志刊出，那一年我十七岁。对于这本杂志我至今都心存感激，现在还有许多朋友在那里工作。后来我被派去参加青年文学批评讲习班，在讲习班里我幸运地结识了很多至今依然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其中包括叶甫盖尼·什克洛夫斯基。他那时已经是很有名的批评家，在《新文学评论》工作，这家杂志日后成为我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那段时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无比热闹，出现了很多新电影、新作家、新事物，成立了很多新团体，以至于产生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圈子”这个专用语。我也参加了很多活动，不过我最重要的收获是从1989年开始在莫斯科的刊物上发表东西。其实我早就往莫斯科投寄过稿件，但那时没有人理你。现在情况有了转机，《新世界》给我打电话，《文学问题》也请我写文章。

**侯：**也就是说您进入了首都这个文化界的前沿，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讲应当是转折性的标志。

**利：**对。热尼亚·多布连科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很活跃，他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我和他在一次会议上结识，成为好朋友。热尼亚总是比我早行动。

**侯：**他也比您大。

<sup>①</sup> 这所大学几度更名，1930年成立时名为乌拉尔工业师范大学，1932年更名为乌拉尔师范大学，1933年更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1991年更名乌拉尔荣誉国立师范大学，1993年更名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

利：不过就大两岁。他写了很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有人告诉他我也研究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开始推荐我的东西。那时我虽然人在叶卡捷琳堡，但是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刊登在莫斯科的各种杂志上：《旗》《新世界》等等。

侯：那么您是怎样进入美国的斯拉夫学界的？

利：这缘于我发表的文章、参加的会议以及结识和交往的同道中人。1992年我去莫斯科进修期间，多布连科介绍我认识了伊琳娜·普罗霍洛娃，她那时是《文学评论》的主编，她决定创办《新文学评论》杂志和出版社，把我们这些人都联结在一起。伊琳娜真可以说是我们的庇护人，我们都成了《新文学评论》杂志的作者，有机会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于是我被很多杂志发现，也被美国的斯拉夫学界发现，借此而结识了更多好友。那时他们得到了很大一笔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赞助，定期在俄罗斯、美国和英国举办会议。在莫斯科《星火》杂志举办的会议上，我认识了一批才华卓越的斯拉夫学者，如斯拉夫学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叶莲娜·卡什拉，研究曼德尔施塔姆和巴别尔的专家格里高利·费金；在伦敦举办的会议上，我认识了第一部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书《苏联长篇小说——作为仪式的历史》的作者叶卡捷琳娜·克拉克，还有一些研究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的学者等等。那时正好有美国富布莱特计划的指标。九十年代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计划，我说我试试吧。于是填了表，并通过了面试。你们知道富布莱特有这样的规则，你必须找到一个接待你的城市和导师。伦敦会议上恰恰来了匹兹堡的代表团。我就和他们谈好了合作的事情。在匹兹堡大学做富布莱特计划期间，我完成了有关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那本书，那是1994年，当时在俄罗斯还没有人搞后现代主义。回国后我用它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我的副博士论文要早得多，题目是《文学神话诗学》，后来也出书了，而这部后现代主义的书稿是俄罗斯第一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博士论文。这时我妻子来到美国信息情报学专业最为著名的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那香槟分校进修，巧的是多布连科介绍我结识的玛丽娜·巴琳娜教授也在这个学校，她那个教研室忽然有一位同事离开，留下的位子急需填补，于是我被建议去了那里。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在伊利诺伊过了几年，后来搬到芝加哥，最终在科罗拉多稳定下来，一直生活至今。

温玉霞（以下简称“温”）：您以前的很多同行现在都侨居国外——美国或者英国，能否冒昧地问一下：你们从事的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为什么要移居国外呢？

利：我移民的时候，我们这个职业在俄罗斯很难生存，从生活方面考虑，到国外经济状况会好很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于，那时在俄罗斯的图书馆很难找到西方的学术资料，这给科研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做好学

术研究就必须有好的资料文献。

**侯:** 那么是否可以说您移居美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自由?

**利:** 为了更多的自由是无可辩驳的。我们在美国学到了很多, 美国当然有更多的自由, 更多的资料, 更多的在俄罗斯所没有的机会。在俄罗斯真正有活力的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莫斯科, 另一部分在彼得堡。我们都不是莫斯科人, 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两个方案: 要么去莫斯科, 要么去美国, 而相比去莫斯科, 去美国反而容易些。机缘到来, 我们就去了美国, 生活就是这样。在美国工作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工作, 给你很大的机动性。

至于说更好的生活, 说实在话以前都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我需要养活我的家庭, 我的儿子。你们知道在俄罗斯高校里副教授的工资是多少吗? 一万一千卢布, 也就是四百美元, 相当于两千五百元人民币, 而俄罗斯的物价比中国还高, 那时真的是无法生活, 非常艰难。现在我的儿子已长大成人, 二十八岁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生, 正在写关于八十年代俄罗斯地下艺术的论文。我的妻子也是语文学家, 我们在一个教研室工作, 她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化, 我们家自己就可以组成一个语文系。

**侯:** 很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觉得您这一批侨民与此前的三次侨民文学浪潮有什么区别?

**利:** 我们不完全是以前的那种侨民, 以前的侨民去国甚远, 从此与祖国几乎中断了联系, 失去了很多可能性, 而我们是职业移民。我现在拿的是俄美双重身份, 和在俄罗斯时一样, 做的还是以前的研究工作。我的好朋友多布连科、谢廖沙·乌沙金也是这样。这种移民的初衷是为了更多地实现自我。我的父母一直在叶卡捷琳堡生活, 由我的弟弟照顾。我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甚至多次。我父亲也曾去过美国, 他很喜欢那里, 但是以他当时的年龄在美国找不到大学工作。他在2010年去世了。所以我说这不是完全的移民, 我们现在有两个家。果戈理当年不是经常在意大利生活吗? 也没有人说他是移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和国内还经常合作, 我们的书在国内和国外都得到出版, 经常是英语和俄语两个版本, 这比只在俄罗斯或只在美国出版都要好。

**侯:** 现在让我们聊聊当代俄罗斯文学界的整体状况。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相当自由的一个时代,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由是一把双刃剑, 也有评论家认为“自由只能把《战争与和平》出版得更漂亮, 自由永远也写不出一部《战争与和平》”。不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利:** 自由是一件好事。《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奇特的作品, 它产生于长篇小说杰作频出的十九世纪, 但我们不能就此说只有十九世纪的文学是好的, 二十世纪也同样

有丰富多彩的文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文学样式是最多的。其实苏联时代的阅读面比现在要窄得多。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当年出版时只印了五十册，只有很窄的读者圈子知道她的名字。而现在文学是多么繁荣！当然，自由越多，文学就越复杂。我害怕的是不够自由，比如前一段时间颁布的条令，禁止脏话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我认为这是对话语自由的扼杀。作家有权利使用任何词语表达他想说的东西。如果你打开本子，首先告诉你这么多不能写的东西，那实在太可怕了！

侯：有些评论家说十九世纪有书刊审查制度，但那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可现在完全自由了，文学却不那么伟大了……

利：“黄金时代”的说法出现在五十年以后，如果你去读十九世纪当时的评论，哪里有这样的盛赞？

侯：是，别林斯基就曾经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文学。”

利：维亚泽姆斯基也有类似的说法。《战争与和平》第一卷出版时，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老套的小说，“现在谁还需要这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每出一部新作都要受到谴责，托尔斯泰回避去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是成不成体统的作家。契诃夫的一生都受尽指责：他的方向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流派？他作为作者的立场在哪里？他的话剧说的是什么？你们也一定知道果戈理受到的那些攻击。可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纪，却在提我们有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大家。我想这都是正常的过程，也许这就是文学的规律。而那些在当时轰动的作家却往往不能留名青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有名的诗人是纳茨，比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有名多了，也比帕斯捷尔纳克有名；纳茨之后是阿布赫京，人人都读他的诗，现在谁还读纳茨，谁知道他呢？果戈理时代最有名的剧作家是库格尔尼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与他们竞争的是比谢姆斯基，而契诃夫嫉妒的是波普雷京，因为他没有后者受欢迎。所以文学史的同步画面中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时代不同，世界观就会不同，为什么要重复以前的世界观？十九世纪结束了，那十九世纪的世界观怎么能重复？对《战争与和平》最成功的模仿是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也正因为此它不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如果不是这样一味的模仿，它的艺术水准将非常高。

侯：还有关于文学的地位问题。过去是文学中心主义的时代，现在文学边缘化了，您觉得是进步还是倒退？

利：文学中心主义在很多方面是文化限制的后果。当一个国家没有自由的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时，文学就承担起了所有这些功能。文学的作用像是对那些没有得

到发展的学科的补偿。等这些学科都得到或多或少的自主发展时，文学的影响当然就会降低。第二，文学现在遭遇了那些视觉艺术的竞争，这个竞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文学不得不让位于视觉艺术。不过我认为这些视觉艺术实际上都与文学密切相关。另外，我认为文学虽然不占据中心地位了，但它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网络。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要读很多大作家的书信集，现在谁还手写信呢？文学形式在网络上得到了极为丰富的发展，出现了与我们的阅读习惯完全不同的新体裁，这些新形式都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比如很多新诗都是发表在facebook上的。

**侯：**我们再来谈谈各种各样的“主义”。“后现实主义”这个词出现在您和父亲合写的文章和合写的专著《当代俄罗斯文学》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我知道您多年都是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工作，这实在是莫大的幸福。你们之间是谁创造新的思想？

**利：**当然是我的父亲。1998年我父亲来美国看望我，我们就商量写一部《当代俄罗斯文学》。我们确立了篇章结构，做好了分工，然后分头去写。你知道这部书很大，是两卷本，先是一个出版社给出版，后来另一个出版社也给出版了。它成为战后文学的主要教科书，所有教授俄罗斯文学的大学里都用这本书。它最重要的地方在于概念的创新。我们将文学划分为三个支流：官方的苏联文学、侨民文学和地下文学，以及三种主要流派：传统的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这部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我父亲在这部书中正式确立了后现实主义理论。

**侯：**我在自己的专著《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中也借用了后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我理解的后现实主义是那些既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实质、又吸纳了一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素的文学倾向。另外，我还总结了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观察世界的存在主义意识、主观抒情和自白色彩的加强、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以及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等等。总体来讲，我认为后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但是有人向我提出疑问：既然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和超越，那么后现实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吗？

**利：**后现实主义是一个既狭窄又宽泛的概念。八九十年代也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很多并非纯粹现实主义，而是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所学习和借鉴的作品，我把它叫做后现实主义，这是从狭义的方面说。其最鲜明的例子就是马卡宁的创作。我父亲所理解的后现实主义是个更加宽泛的概念，他把普拉东诺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都纳入了进来，他总结的所有这些后现实主义的特征其实都是现代主义的特征，只是他在心理上不愿意承认这是现代主义（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他就把这些作为一个独特的现象来研究。

我们再来谈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是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继续。我们知道，现代主义包含很多的流派，有先锋派、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小说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现代主义。它们在后来的发展中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所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之一。西方和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产生的，是准备用新的现代主义来反对旧的现代主义。在俄罗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俄罗斯的第一部后现代主义文本产生于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它的产生是为了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了复兴于二十年代被人为中断的俄罗斯现代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想回到现代主义，却造就了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个区别：西方文化中后现代主义与左翼意识形态相连。福柯说：“我们在1968年巴黎街头没有做到的能够在自己的书中做到。”那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而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更多是为了与左翼意识形态相对抗。总之，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不是与现代主义对立，对此我已经在《悖谬逻辑：1920—2000年代文化中（后）现代主义话语的转化》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侯：我读过这本书，并且写过一篇介绍文章。

利：是汉语写的吗？

侯：是，发表在我们的《外国文学动态》杂志上。

利：请送给我一本好吗？

侯：好，当然可以。您刚才说的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和俄罗斯产生原因的不同，那么在表现特点上应该也有不同之处吧？

利：当然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在很长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整体性的反思，仅仅在概念主义者中或者说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圈子里形成了学术性的语言而已。而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哲学远远跃出了美学范畴，那些著名的理论家——利奥塔尔、福柯、德里达都确实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改变了人文和社会学科。

温：您觉得后现代主义的前景怎样？

利：后现代主义是存在危机，这是必然的，但就像今天我在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后现代主义没有终结，而是有它的未来。你们知道在西方有近期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指的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实。很久以来我们都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而我觉得现在后现代主义更多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存在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即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后现代主义意识深入到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具体的学科中，由此而更新了今天的文学。

温：您认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索罗金吗？您觉得他是怎样的作家？

利：我喜欢他。

侯：您好像在今天的报告中说他是当代俄罗斯最好的作家？

利：是的，我认为他是当代用俄语写作的最好的作家。当然我也喜欢佩列文，但是佩列文的新作实在不太成功，而索罗金一直在成长。

侯：您读过当代年轻人的作品吗？比如普利列平、先钦……

利：读过。我写过一篇关于普利列平的长文，发表在《旗》杂志上。我对他批评很多。他给我的感觉很像法西斯。他可以说是我思想上的敌人，所以我无法接受他。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令我感兴趣的是一批年轻的剧作家和他们掀起的“新戏剧”运动。我觉得现在诗歌比小说更加复杂。

侯：您现在主要在从事哪个方面的研究？

利：我在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文学，其实这是我父亲的愿望。你们知道《当代俄罗斯文学》考察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文学史，完成这部书后父亲就准备回头去研究二十年代的文学史，他没有写完就去世了。这部书由我完成并于2012年出版了。现在就剩下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文学了。我和多布连科等同仁形成了一个集体，共同来研究这段时期的文学。我们的作者生活在世界各地，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出版六本研究专辑了。

侯：在俄罗斯能买到吗？

利：能买到。我们这些书都有俄语和英语两种版本，在俄罗斯和美国都能买到。

侯：多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您圆满实现自己的研究计划！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